

社会进化型史观刍议

李怀顺,王 建

(西北师范大学 文史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为进一步对历史哲学进行归类整理,运用对比分析的方法,对思辨的历史哲学中的一类具有独特特征的历史观进行界定。分析认为:社会进化型史观是一种有着自己明确内涵和外延的历史哲学类型;它有自己的历史沿革,是一种独特的理论范式;它与社会进化主义等关系密切,但也绝不能混为一谈;它担负着升华出一种新型历史哲学的重任。

关键词:社会进化;历史观;历史哲学;历史决定论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2)01-0109-11

人类的社会历史观念随着人类科学知识和改造自然能力的增长而不断发展。由于当时人类认知水平的限制,最初的历史观念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大多数的历史学家都不自觉地把人类历史当做一个过程来对待。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自我肯定的信念也与日俱增,历史观在这种日益增长的信心和乐观主义中实现了由过程向发展的伟大变革,社会进化型史观就是在这种变革中应运而生的。因此,考察它的所以由来的知识根源并弄清它背后的思维逻辑,对于我们定义并进一步辨析这种类型的历史观至关重要。笔者拟对这一问题做尝试性探讨,并得出进一步的结论。

一、宇宙作为一个整体的进化与社会进化观念的思维逻辑

在承认现有认知范式的前提下,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可以将许多知识认定为是确定无疑的。它们不仅是知识,还可以作为进一步推论的明确的或隐含的前提假设而不必疑其为非,用奥古斯特·孔德的术语来说就是,这些知识是可实证的,这些知识

无疑可以包括下面将要提到的陈述:

宇宙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不断生长的过程,虽然科学家对宇宙的起源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知,但可以确定的是,宇宙自上百亿年前诞生,时间和空间随之诞生(人类现有的认知范式就是以承认时间和空间为绝对前提的)。随着宇宙的生长、太阳系的形成,原始大气、原始海洋和最初的大陆随着地球的生长得以成形。

生命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从最初的生命到高级的灵长类动物,各类物种先后在地球上出现。而人类在进化树上的位置是哺乳纲、灵长目、人科、人属、智人种。不仅如此,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其体质本身的演变过程是类人猿、能人、直立人、智人和现代人。大脑作为人类体质进化的一部分也变得日益发达,文化和社会也随着人的产生而产生。

历史学家基于以上的知识图景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是:如果宇宙、生命乃至人类本身都是一个进化的过程,那么文化或社会是不是同样进化着的呢?“哲学主要是通过理性思辨和直觉来思考进化问题,它往往更容易提出一些大胆的论点。文艺复兴之后进化主义的新生,首先在哲学家那里展现了出

收稿日期:2011-09-26

作者简介:李怀顺(1964-),男,山东安丘人,教授。

来。他们在两个方面推进着进化主义,一方面是对宇宙起源的看法,另一方面是对自然史和人类社会历史领域所抱有的进步信念。”^[1]

不仅如此,如果一个历史学家声称,一个理想的自然发展的社会历史进程在总体上必然会是一种全面的线性的进步过程”,他总能列举出一大堆言之凿凿的“事实”证据,而且我们也应该承认,这些证据很难予以反驳。例如,“假如我们将1000年前第二个千禧年开始时的人类福利同现在第三个千禧年开端的人类福利进行比较,大部分人都会认为有了进步:大部分人的寿命延长了,婴儿的死亡率降低了,营养得到了提高,卫生条件得到了改善,穿衣和住房问题也有了改善,读书识字率提高了,天花已经被消灭。虽然肺结核依然具有杀伤力,可能甚至还会夺取很多人的生命,但得病率已经下降。生活的其他基本方面得到了改善”^[2]。

由于部分或全部的历史“明显”地呈现或表象或事实的“进步趋向”,许多历史学家基于此形成的历史进步的思维倾向,也就变得容易让人理解了。基于进步“事实”的进步观念是历史理论本身的进化过程中的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线,这道风景线又反过来引导着人们在头脑中进一步“塑造着”历史进步的“事实”。

此外,当人们由衷地赞叹历史学家洞察古今的深远眼界时,却不知道他们是“历史近视症”威胁下的高危人群。实际上,历史学家身处的当下局势对他们思想观念的影响一点也不亚于历史事件及其过程对他们的影响。“没有人能够真正地超出他的时代,正如没有人能够超出他的皮肤。”^[3]当下局势无情地压在历史学家的头顶上,人们往往看不见它。上升社会中到处洋溢着的乐观精神深深地感染着历史学家的思想,正如天灾人祸的暗无边际经常会给历史学家的视界蒙上一层阴郁的色彩。当下局势就是这样悄悄地在历史学家的头脑深处潜伏下来,并与他们一起扮演了历史理论共同建设者的角色,它的分量可以从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斯宾格勒文明衰落观中窥见一斑。最直接的表象成了最不易为人们觉察的因素,答案很简单:它们最容易被忽略。

二、社会进化型史观:概念、特征、历史

(一) 社会进化型史观的概念及其初步正名

社会进化型史观是指那些认为理想的自然发展

的社会变迁从总体上来说必然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过程的理论。这种类型的历史观并不像有些批评家指责的那样低估了历史过程的多变性和复杂性,但它们的持有者展望未来时,总是带着一种不加掩饰的乐观主义的论调,甚至于走向了一种用未来剪裁历史的极端,他们相信可以从杂乱的历史事件中洞悉历史总体发展的趋势,并可以用这个总体趋势预测甚至指导建设一个更高类型的社会,认为这样就可以减轻将来社会转型所必然带来的“分娩的阵痛”,所以他们总是“试图在一大堆貌似杂乱无章的历史事实背后,寻求出理性的原则、规律或意义来”^[4]。他们这样做的理由也很充分:如果生物学家能从几十亿年的无比复杂的生命演化过程中最终总结出一种“进化的机制”,那么历史学家又如何不能从纷繁芜杂的人类现象史中发现“有规律的统一的过程”呢?现在没有发现,只不过是因为人们还没能掌握足够的历史知识,现在没能发现并不代表永远不能发现。的确如此,“回顾整个进化思想发展史,可以看出,欧洲进化的思想源自古希腊,历经2000年的休眠,至17世纪再度萌发”^[5]。因此,“不管它们的原因可能是多么隐蔽,但历史学却使人希望:当它考察人类意志自由作用的整体时,它可以揭示出它们有一种合乎规律的进程”^[6]。实际上历史学家从未放弃过这种“要发展一项通则性的社会科学理论”的追求。“把从工具理性及其与之相联的物质世界中所产生的进步信心,扩展到对人类道德、人性和精神领域的更强烈的进步信念,一直到19世纪都兴盛不衰。人们稍微注意就会发现,在不同的观念和思想体系中,都发展着共同的主题和信念:历史是进步的,历史进步是必然的。”^[1]

任何此类题目,如果稍一提及“进化”的字眼,必然使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所以笔者在此首先理清社会进化型史观与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的关系就显得非常必要了。任何严肃的不以某种先入为主的观念为前提且认真阅读并充分理解了达尔文《物种起源》的人,都应该承认:达尔文本人在《物种起源》中所阐述的绝不是一种可以简单归结为“生物进化论”的理论。“在达尔文看来,将进化表示为‘进步’这样的论述,错误太明显了,所以他在笔记中提醒自己,在谈到不同生命形式时,‘绝不说高等或低等’,不过他本人并没有一贯地遵守这个诺言。”^[7]这也是笔者在选择达尔文理论的名称时,倾向于使用“自然选择学说”而不是人们通常所用的“达尔文进化论”的原因。达尔文学

说是按照变异—广义的生存斗争—适者生存的逻辑逐步展开的,他从未试图构建过一种“进步者生存”的理论。“在中文中,将 evolution 翻译为演化而非进化,会更接近这个词的本意。也就是说,对于生物进化而言,除了绝对存在的时间箭头(熵增)之外,其他所有被认为存在方向性的认识都需谨慎对待。”^[8]这就是说,达尔文并不认可“进化”的进步性方向,进化在他那里更应该说是无方向的或任意方向的。“自然选择并不是一道咒语,而是一个盲目的、无目的的机会主义的过程。”^[9]对于自然选择学说基本原理最经典的概括莫过于达尔文在《物种起源》最后一章中的一段简述:“由于每个物种都有按照几何级数过度繁殖的趋向,而且各个物种变异了的后代,可以通过其习性及其构造的多样化去占据自然条件下多种多样的生活场所,以满足数量不断增加的需要,所以自然选择的结果就更倾向于保存物种中那些最为歧异的后代。这样,在长期连续的变异过程中,同一物种的不同变种间细微的特征差异趋于增大,并成为同一属性的不同物种间较大的特征差异。新的改良变种必将代替旧的、少有改良的中间变种,并使其绝灭,这样物种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为确定的、界限分明的自然群体了。”^[10]但是,“人们之所以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坚定不移地认为进化等同于进步,是因为人们怀有一种古老得多的概念,认为世界是根据等级制而划分成各种类别与阶层的。”^[9]

因此,为避免上述这些微妙关系已经引起的误解再进一步引起误解,对社会进化型史观概念做出2点澄清是可取的:第一,本文中的“进化”一词就是直接在“进步的进化”的意义上运用的,也就是说,社会进化型史观均承认,社会历史变迁大致上适应一套呈进步趋向的普遍规律或变迁模式;第二,运用这个词,正如19世纪人们运用它时所强烈昭示的那样,旨在与一切神学意义上的或带有明显神学痕迹的历史理论划清界线。

(二) 社会进化型史观的特征

社会进化型史观是一种特殊的理论“范式”,这一“范式”认为,研究历史可以发现关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并可以据此预见未来历史发展的进程。“思维的任务就在于通过一切迂回曲折的道路去探索这一过程的依次发展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11]如果说一种“范式”不同于另一种的地方在于它们各自迥异的气质,那么我们现在所讨论的这种“范式”在历史研

究单位设置基础上所具有的进步取向的阶段论、乐观主义的未学主义、非神学化的关于普遍规律的元叙述等鲜明风格,是其引人注目的闪光之处。

历史研究单位是历史理论演绎的起点,是纵向历史大厦的横向基石,是“一元多线”的历史体系中各线的历史形成的最初规定性。在历史理论中,横向的空间转换成了线性的历史,历时性单位又可以随时还原为地域概念。即使有的历史学家在其理论中从未对其加以专门考察,历史研究单位仍然是历史学家在其理论进程上的最初脚印。历史学家用各种各样的历史研究单位解释问题,但是他们所设定的研究单位多半不能超出“社会”一词的范畴。“历史研究的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单位,既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也不是另一个极端上的人类全体,而是我们称之为社会的某一群人类。”^[12]不难看出,在这里汤因比视“社会”与“文明”同义。由于这个词在其广义性上极其宽泛和模糊的含义,以至于我们可以用它来概括一切研究单位,“文明”也是一样。“许多国家很久以来就使用着‘文明’一词,人们赋予它的涵义有广有窄,有的较明确,有的较模糊,但这个词已经被人们所使用和理解。正是这个词普遍的、人文的和通俗的涵义,才是应该加以研究的。”^[13]

本体论的历史观不外乎历史倒退论、历史循环论、历史进步论、历史碎片论和历史虚无主义。其中,历史进步论以其对于“进步”的坚定信念,给人以深刻印象。社会进化型史观更是以其历史进步体系的宏伟设计而成为历史进化论的集大成者。自近代以来,一种梳理社会历史进步历程的迷思成为历史学家们压倒性的热望。这种热望随着历史学家视野在时空上的拓展而越发巩固,并在启蒙运动中达到高潮。康德的进步思想就很具代表性,“把从个别主体上看来显得杂乱无章的东西,在全体的物种上却能够认为是人类原始的秉赋之不断前进的、虽则是漫长的发展”^[6]。

根据历史发展的实际或者是出于更方便研究历史的需要,历史分期一直是历史学家难以割舍的嗜好。社会进化型史观的承认历史有某种间断性或飞跃的进步观念在理论形式上具体体现为拾级而上的阶段论。“文明的衰败崩溃,也许是通向具有更高的宗教意义的事物的进步台阶。”^[14]既然社会从低俗阶段步步高升到我们所处的“进步台阶”,社会进化型史观对未来持有的那种乐观主义的态度,也就不难为我们所理解了。

如果说“历史学家是为了过去本身的缘故而研

究过去,并不是为了期待那种研究可以对事件的未来进程投射一道光明”^[15],那就未免太武断了。认识历史和改造现实世界,必然包含着对未来的强烈关注和浓厚兴趣。正如布罗代尔引用费弗尔所说的,历史学的价值就在于它“既是过去的科学,也是未来的科学”^[16]。从本质上说,未来就是历史的延伸,从认识上也是如此。“我们形成关于历史的观念,部分是出于当前的目的和需要。过去就像一块银幕,我们在它上面投下了对未来的幻想。”^[17]如果真如分析的历史哲学所声称的那样:“历史学并不是对‘客观的’事件,而是对写它的人投射了光明,它不是照亮了过去而是照亮了现在”^[15],那么未来也有同样的功能,它也就取得了历史同样的性质和地位:两者都只不过是现在的投射。“这里只有一个世界,那就是当前经验的世界。”^[15]“只有现在是被经历的。过去与未来是视界,是从现在出发的视界。人们是根据现在来建立过去和投射将来的,一切都归于现在。历史之难写,正在于它与我们现在有关,与我们现在看问题的方式以及投射将来的方式有关。只有一个时间,那就是现在。”^[18]分析的历史哲学在这里取消了历史与未来的区别,将自己引入了一个悖论里,却为思辨的历史哲学关注未来取消了障碍。实际上,对社会进化型史观持有者来说,未来才是他们的关注点,甚至可以说,持历史进步论的历史学家因为有了对未来的热切关注,才产生了对历史的强烈兴趣。未来对他们来说永远是一个流着奶和蜜的伊甸园,而不管道路是如何的崎岖。

不能将社会进化型史观简单地等同于历史进步论,衡量历史进步论是否达到了社会进化型史观高度的主要依据之一是“神”或“神的意志”在该理论体系中处于何种地位。在神学史观或神学色彩浓厚的历史理论中,那种对最高判决者的敬畏来源于人们对终极原因探讨的迷狂。人类的无知和无奈产生了对神的需要和依赖,上帝居于人的知识末端,即使博学如兰克者也不脱窠臼,“我们所面对的作为人类事务一部分的个人生活,一代人的生活,乃至一个民族的生活,无论能否解释,都时时可以看见一只高高在上的上帝之手”^[19]。但是,社会进化型史观一个典型的特征就在于这种类型的哲学明显缺少对神的眷恋,上帝在这里被抛弃和超越了。“我们不解决这些问题,而是超越他们。”^[20]在这一点上,他们的哲学是与奥古斯特·孔德的哲学相通的,他认为对终极原因的探讨是徒劳的,“因为那根本不是一个知识问题,神学家和形而上学家可以对那样的问

题加以想象和推敲,但实证哲学拒绝探讨它们”^[21]。这一点,柯林武德也清楚地意识到了,“它是服从着实证主义的精神而在进行的……单纯为了事实而确定事实是无法令人满意的,它的合理性的证明是远在它自身以外的某种东西之中,那是这些已被确定的事实所能够做到或者应该做到的”^[22]。这种“它自身以外的某种东西”,就是关于普遍规律的元叙述。“在历史学和各门自然科学中,普遍规律具有非常相似的作用,它们成了历史研究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它们甚至构成了常被认为是与各门自然科学不同的具有社会科学特点的各种研究方法的共同基础。”^[17]历史学家对这种普遍规律的追求使社会进化型史观生来具有显著的形而上学特征。

(三) 社会进化型史观的历史

基于上面对社会进化型史观的概念和特征的考察不难看出,我们可以从过程性、整体性、进步论和去神学化等方面来探究它的发展历程。

只有历史行程走得足够长时,人们的历史眼光才能投射得足够远;只有人们在历史的长河中回溯得足够远时,才有可能发现历史脉络的趋向性。在浪漫主义者那里,这个脉络开始不再因“启蒙运动仅仅关怀着现在和最近的过去的倾向”而被中断,“历史学思想的范围大为开阔了,于是历史学家就开始把人类的全部历史认为是从野蛮状态开始而以一个完全理性的和文明的社会告终的一场单一的发展过程”^[22]。同样,只有人们的行动范围足够广,历史研究的地域概念才有可能变得同样广阔,当这个概念扩展到全球时,全球性史观的产生才有了可能。在开辟新航路激动人心的史诗般探险中,“坚忍不拔的水手和征服者,冒险闯入大西洋和印度洋的公海,把欧洲的旗帜插遍了全世界”^[23]。当地理学家终于将他们拼图游戏中的最后一块按向世界地图的左侧时,以地球上所有历史单位为舞台的崭新史观应运而生了。“旧大陆的人把自己的历史眼光第一次投射到新大陆上,整个地球开始在同一历史观下被思考。”^[24]

最初的历史观以历史倒退论的形式表现出来,随后主要表现为历史循环论。历史进步思想的萌芽,我们可以在修昔底德那里探寻得到。直到中世纪,“基督教开始在历史上自觉”^[25]。有的历史学家甚至认为:教会史学“首次真正粉碎循环的观念、人类事物永恒回归其起点的观念、达娜伊得斯们徒劳无益的观念(圣奥古斯丁也反对循环论);历史首次被理解为进步……”^[26]但最终真正突破历史倒退论

和历史循环论束缚的是孔多塞。他的“《人类精神进步的历史概论》常被人们说成是18世纪法国思想的遗嘱,它留给19世纪的主要是关于历史进步的观念”^[24]。因此,历史思想中进步观念的大致历程是“连续与发展的观念早在古希腊哲学中就曾出现过,在基督教神学中,连续与发展的观念更是在世界历史整体的进程中得以彰显”^[27]。启蒙思想家虽然不遗余力地抨击基督教神学,但是他们继承并发扬了教会史学的进步观念。历史进步的观念是启蒙思想突出的特征,那时的思想家们从“共同的人性出发,来探求历史变化的规律性,普遍相信历史运动的前进性和可预见性,认识到人类会有一个光辉灿烂的将来”^[25]。但是物极必反的法则似乎同样在思想领域里起作用,进步的思潮在走到它的极致之后也带来了它的回潮,让·波丹进步观的“冲击波随着历史的长河一直越过维柯、黑格尔和马克思,直到遇上了尼采、斯宾格勒及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才受到了阻力。从此,进步史观开始受到质疑”^[25]。

前文说过,对终极原因的探讨必将走向神秘主义。实证哲学以承认知识有限的谦逊坦诚,认为对任何初始原因或终极原因的探讨都是徒劳的。历史观念去神学化过程同样需要在抛弃对终极原因探讨并将其理论建立在有限而坚实有效的历史知识的基础上才能最终完成,近代以前的历史学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注定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古希腊历史学家虽然有强烈的重人事而轻神灵的所谓“古典人文主义”倾向,但“他们的思维模式中往往给最高和最后的判决者的神灵留下一个席位。”^[28]到了中世纪,历史更是成了纯粹的神的历史。“当基督教从犹太教中分离出来,基督徒开始进行历史写作时,我们不能忘记,上帝总是每一位写作者的精神支柱。”^[27]格列高利甚至认为,“历史已变为‘神学的低贱的婢女,即精神的失常’”^[26]。文艺复兴时期,尘世的历史取代了天国的历史,历史学去神学化进程迅速推进,以至于我们可以把那个时期称为历史学的“世俗化时代”。启蒙运动时期批判精神的树立,使“历史学家进一步摆脱了超自然的神秘力量主宰人类命运的传统观念,努力用怀疑的态度、批判的精神,从人类活动本身解释人类历史发展”^[29]。随着历史学去神学化过程的完成,成熟时期的历史进步论便以社会进化型史观的面貌呈现出来了。

三、社会进化型史观拾例

社会进化型史观是在历史观念的进化历程中逐

渐具备上述特征才得以达到其成熟状态的,只有当历史带着历史学家能在时间的长河中回溯得足够远时,人们才有可能理清历史的脉络,这是古代的历史学家们注定无法完成的任务。“心灵的视野就像眼睛的视野一样,只有当观察家已经在他和他的对象之间保持一定距离时,才会进入焦点。”^[14]中世纪神学笼罩下的史学范式同样无法在它的整个社会范式背景衰败之前完成最终的转型。启蒙运动时期,占据社会思潮主流的进步观念成为社会进化型史观迅速成长的温床,它的成熟形态就是在那片沃土中孕育着。黑格尔是在“力图把经验的内容提升到必然的真理的高度”^[15]的过程中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人物,但我们不能将他的历史哲学称为第一种社会进化型史观,是因为用神秘的“绝对精神”去解释世界历史,从根本上说也是一种“思想深处的神学残余”^[26]。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历史不过是上帝计划的实施,理性是人们用来领会上帝这项神圣计划的手段”^[30]。此外,如果历史哲学领域真有一张“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的话,那么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体系就是再合适不过的例证了。他那“世界历史表现原则(即自由意识)发展的阶段”^[31]的历史阶段划分理论,就好像将张三的童年、李四的青年、王五的成年和赵六的老年硬生生拼接起来的怪物,干瘪的思辨理论僵硬地剪裁着丰富的历史内容。黑格尔说没有人能够真正超越他的时代,他自己也不例外。启蒙思想孕育着成熟形态的社会进化型史观,它的诞生却在启蒙运动之后。前面提到,奥斯古德·孔德明确提出要“以单纯的规律探求,即研究被观察现象之间存在的恒定关系,来代替无法认识的本义的起因”^[32],而且他还将这种实证哲学直接应用于历史学领域。但是实证主义寻求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同一性,使历史学完全拜倒在自然科学的脚下,因而也就取消了历史学的独立性。“实证主义可以定义为是为自然科学而服务的哲学,正如在中世纪,哲学是为神学而服务的一样。”^[22]因此,我们也不能把奥斯古德·孔德的历史理论认定为第一种成熟形态的社会进化型史观,后者只有在继承启蒙思想而又超越启蒙思想且以一种独立自信的面貌呈现出来时,才宣告了一种崭新的史学范式的最终诞生。自那以后,它就以“科学理论”的形式证明着人类的美好未来,到处驱散着历史和现实的苦难带来的笼罩在无助的人类心灵上厚厚的阴霾。

(一)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学说,却被人们僵化成一种

教义;马克思不是耶稣,却被人们挂在了十字架上。今天,人们给马克思主义贴上了太多太多的标签,所以我们在这里再给唯物史观贴上“第一个成熟形态的社会进化型史观”的标签也无妨大体。不过,正是由于这些过多的解读,所以我们最好把发言权让给马克思,而不是对唯物史观做进一步的解读。马克思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经典表达见于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达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既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到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1]

虽然如此,我们指出以下3点是很有必要的。第一,马克思并没有在哪一部著作中专门给唯物史观下过一个完整明确的定义,他的观点散见于各个时期的不同著作中。第二,唯物史观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不仅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形态的划分有多种不同的表述,而且这些表述与圣西门、傅立叶的相关表述相比具有明显的继承性。不仅如此,我们现在所惯用的那种人类历史发展顺序的表述方式,是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对马克思观点的一种概述。第三,历史学家在套用唯物史观的理论来研究西欧以外国家的历史时应格外谨慎。“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种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1]可以说,现阶段,我们并不缺少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而是缺少马克思的精神。“实际上,我们至少为了临时性的目的,正是将我们的信任建立在我们从马克思主义那里继承来的批判分析的形式之上:在某种既定的情景之中,只要它在社会—政治对抗性的情形下起

决定性作用的或是确定了,那么一种霸权势力似乎就总是由占统治地位的修辞和意识形态来表现出来的。”^[33]

(二) 汤因比的文明形态史观

自黑格尔以降,的确有几个试图用贫乏的理论剪裁丰富的史实之嫌的历史学家,其中最为有名的就算是汤因比了。虽然他引用了大量的史实来支撑自己的理论,但是这丝毫掩饰不了他试图将庞大的历史躯体强塞进其干瘪的理论外壳的事实。他的文明形态史观像马克思唯物史观一样,首先是一种对西欧社会或文明发展史的总结,所以当他在观察西方以外地区的历史时不得不在其原有发展模式之外添上一种治乱交替的中国模式和一种民族成员四散各地、民族认同却始终保持的犹太模式。

或许有人会对我们这种将汤因比的文明形态史观列为一种社会进化型史观的做法提出疑问。将文明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的演进模式视为一种历史循环论的观点有其道理,但汤因比本人从不认同历史循环论,认为这纯属无稽之谈,他将文明的衰落视为通往更高宗教意义的事物的进步台阶。这种对将来谨慎的乐观主义的观点将他与斯宾格勒区分开来,所以采取一种认为文明形态史观具有半循环论半进步论性质的观点更加合适。还有的学者认为“汤因比的历史哲学是向神学阶段的复归”^[34],但我们应把汤因比的神学观点视为一种他对其理论体系之外东西的思考,且这种思考并不妨碍原有理论体系的完整性。这一点与牛顿的经历颇为相似,他们都在完成各自的理论体系后,转向对终极原因的思考,但这一问题已经超出社会进化型史观的探讨范围了。合适的做法应该像杜威所说的,不解这些问题,而是超越它们。人们对汤因比的理论褒贬不一,其中沃尔什的观点比较合适:“在思辨历史哲学上,他那活跃的想象力的优点,恐怕是难以压倒他那别具只眼的糊涂心思的缺点的。可是,他的主要功绩或许就在于对于历史本身,就在于他的工作可望突破专业历史学家的狭隘性而把注意力引向通常为人所忽视的整体研究的题材上面去。”^[15]

(三) 卡尔·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期理论

卡尔·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期理论在框架上与汤因比的文明形态史观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其总体结构与后者相比并无多大新意可言,甚至可以看作是后者的翻版,但他对世界历史“轴心期现象”的深刻洞察力仍然令人赞叹。与斯宾格勒在文化“基本象征”基础上提出的各文化间的不可沟通性的主张

不同,卡尔·雅斯贝尔斯轴心期理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强调几种有独立起源的文化形态,“可能存在一种深刻的互相理解”^[35],这种“互相理解”在历史存在“突变”的前提下,又造成了历史统一的可能。“起先几条道路似乎从毫无联系的起源通向共同的目标。”^[35]

但是我们不能就只是这样简单地考察卡尔·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期理论,而忽略这一理论更深的哲学根源。这个哲学根源就是卡尔·雅斯贝尔斯的“世界哲学”思想。“怀着世界哲学的意图,卡尔·雅斯贝尔斯试图证明哲学的信仰,把它作为所有哲学理想的基础。”^[36]在这里,卡尔·雅斯贝尔斯轴心期理论成了其“世界哲学”思想的一个推论,但他对这个术语的解释不甚明确,我们可以大致将它理解为在人类的大共同体中、在一个共同空间中的思想,是人类创造作为统一性的总的交往领域的思维。而提出这一思想又是为现实的双重任务服务的:“必须建立一个世界秩序;必须保留政治自由。”^[36]而这一思想又与极权主义崛起和技术对人类存在毁灭可能的历史境遇息息相关,所以只有将轴心期理论纳入这样的思想和历史背景中,我们才能获得对它的清晰认识。

(四) 托夫勒的浪潮理论

“一个新的文明正在我们的生活中成形,而到处都有盲目的人企图压抑它。”^[37]满怀憧憬,托夫勒为我们描述着正在浮现着的激动人心的未来(更确切地说是现在)。不过,这里的问题是:托夫勒的浪潮理论属于典型的未来学范畴,而不属于与其相反一极的历史学。但是前面我们已经提过乐观主义的未来主义是社会进化型史观的主要特征之一,而且从事物的性质上来说,如果按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说法,历史和未来均是当下经验世界的投射。历史和未来的界限似乎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明确,历史是曾经的未来,未来是将来的历史。作为一种有着强烈未来感的史学范式,将一种或几种未来主义思潮纳入其范畴,并无太大的不妥。如果愿意,我们还可以把社会进化型史观当作是搭在历史学和未来学之间的桥梁,所以在社会进化型史观的领地里,如果不给未来主义留一点空间,它就不是完整的。

更重要的是,笔者把“第三次浪潮”这个名称视为那些试图对未来社会的特征进行定义的概念,如信息时代、全球化时代、后工业化社会等典型代表,所以更确切地说,在这里,“第三次浪潮”是一个类称,在它们当中,未来的图景从历史的视野中展现,未来的车辙为历史的车轮凹现。因此,转过身来往

后看从不代表我们不会再转回身来往前看,对历史的归纳从不排斥对未来的演绎;相反,将社会进化型史观视为全部历史哲学的合理推演。只有把历史的智慧与未来的视角相结合,才有可能为我们自己设定“一个解读人类现在和未来的永恒路标”。得益于未来学家的努力,未来已不只在前方静静等待,而是向等待着的我们呼啸扑来。当然,这其中也不要忘了历史学家的功劳。

四、社会进化型史观辨疑

(一) 社会进化型史观与社会进化主义

从社会进化观念的思维逻辑可以看出,社会进化型史观与社会进化主义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样(这里所讲的社会进化主义主要指斯宾塞的社会进化理论)。在辨别社会进化主义与社会进化型史观的关系之前,有必要先对它与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的关系做进一步的说明。总的来讲,进化的“表象”、观念或事实在自然科学领域产生了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在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社会进化型史观和社会进化主义。与通常人们所认为的相反,社会进化主义产生于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之前,并且对达尔文的理论产生了即使不是决定性的也可以说是巨大的影响。“在达尔文的求学年代,进化的思想正是风靡八方的时尚思潮,甚至已有好几种进化学说在各处流传。”^[9]在这些学说之后但稍早于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斯宾塞的思想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这一点我们浏览一下《物种起源》的引言部分就会很清楚,而且在正文部分可以不时地读到斯宾塞的名字。实际上,“适者生存”这一术语正是达尔文从斯宾塞那里借用来的。“我把这种每一微小有利的变异能得以保存的原理称为自然选择,以示与人工选择的不同。但是斯宾塞先生常用的‘适者生存’的说法,使用起来同样方便而且更为准确。”^[10]不仅如此,斯宾塞还享有“进化”一词的优先使用权。“达尔文当时用转化(transmutation)一词来表述物种的变化,而进化(evolution)一词是1860年以后英国学者斯宾塞在其《生物学原理》一书中才开始使用的。”^[38]而且,“正是因为斯宾塞的提倡,‘进化’作为达尔文学说的核心词才变得家喻户晓”^[1]。今天谁在提到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时,如果他立即联想到“适者生存”、“进化”一类的词语的话,那就恰好说明他正在戴着一副带有斯宾塞色彩的眼镜打量达尔文的学说。因此,不仅达尔文的学

(二) 社会进化型史观与思辨的历史哲学

所有的社会进化型史观都属于思辨的历史哲学(虽然有人可能对把未来主义的某些思潮归类于此的做法表示反对),社会进化型史观以完整的理论形态展现着思辨的历史哲学的成熟面貌。它们都是本体论的历史观,而非认识论的史学观。社会进化型史观可以承接一切加在思辨的历史哲学上的毁誉,所以对思辨的历史哲学误解的辩解,也是一种对社会进化型史观被扭曲的声誉进行恢复的努力。

分析的历史哲学家的断定思辨的历史哲学将历史视为“一种全面的计划”的展开且存在“要超越实际所发生的事件而达到隐蔽在它们背后的计划的企图”^[15]的观点,很可能来自维柯理想的人类永恒历史规划的说法,也可能部分来自于康德“人类的历史大体上可以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的实现”^[6]的观点,或者黑格尔“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40]的表述。而这些都可以归结到奥古斯丁那种尘世历史是上帝安排证明的思想上,继续往上推,我们还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的“不动的推动者”,最终还有“理念”、“逻各斯”一类概念的影子。“计划”的观念可谓源远流长。“人类历史包藏一个秘密计划,如果我们能成功地揭示这个计划,我们将掌握未来的钥匙。”^[41]在分析的历史哲学看来,以上述论述为中心论点的历史决定论的传统从未中断过。但是,这种将历史视为某种计划展开的观点以偏概全地强加在思辨的历史哲学头上的做法,是很不公平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可以与“规律”同一,但不能与“计划”同义。规律乃是自为的,且是一种有限的自为,计划则意味着客体的臣服,必然假设着外在的权威,它总是“一直高高在上的上帝之手”的杰作,因而外在的权威最终不是归于上帝就是归于上帝的别名。可惜我们在成熟形态的社会进化型史观的领地中并没有发现特别设给上帝的席位,因此不难看出,恰恰是分析的历史哲学家“不懂得发现历史的模型与对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的过程规划出一种布局这二者之间的不同”^[15]。

认为思辨的历史哲学具有将历史视为“某种普遍计划或预定计划”展开的观点的误解在分析的历史哲学家那里导致了更深的误解,他们进一步将思辨的历史哲学视为一种“先验的图式”,以至于在偏见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其最坏的事例中,他们的著作带有狂想式的先验主义的烙印,从严肃的眼光看来是全靠不住的。”^[15]不过一个足以令所有分

说在诞生时带有醒目的斯宾塞胎记,而且这个学说在传播中又被蒙上了一层浓厚的“斯宾塞进化色彩”。是自然选择学说一直待在斯宾塞进化主义的阴影里,而不是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即斯宾塞是“生物进化论”在社会学领域的传教士。“我们从来没有忘记他创造的短语‘最适者生存’(斯宾塞创造‘最适者生存’这一短语,比《物种起源》的发表早10年),他是放任主义学说的辩护者。我们甚至把他定义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尽管更确切的看法应该是把达尔文视作生物学的斯宾塞主义者。”^[39]如果我们现在将一种“进步的进化”思想的源头追溯到达尔文那里,恐怕很难符合那段时期几种学说之间微妙而又复杂关系的本来面貌,也很难说达尔文本人不会对出现此种结果尴尬不已。

弄清楚了社会进化主义和自然选择学说的关系之后,就可以更好地认清社会进化型史观与社会进化主义的关系了。简单地说,它们是长在同一树干上分向不同方向的树枝,具有相同的知识前提和观念起源。进化的“表象”、观念或事实从进步和竞争2个方面给我们的世界带来了影响,社会进化型史观论证进步,社会进化主义着眼于竞争,前者属于纵向理论,后者强调横向比较,所以它们之间有着一种历时性观念与共时性观念的区别。社会进化型史观在性质上归类于历史理论,社会进化主义则属于社会学学说。人们在谈论社会进化型史观时,应该明白的是,致力于指出各种社会或文明发展的一般模式必然会赋予它们以相同的性质,社会比较则自然会偏向于个体或群体的“优等属性”。普遍运用显然不同于个别比较,论证“优胜劣汰”机制的思维也显然不能正视各民族、社会或文明千百年来共存发展的历史。理论方向上的分道扬镳如果带来了它们在各自结论上的径庭之差,我们也丝毫不应感到奇怪。心存困惑的人大可不必为这个术语中的“进化”二字劳神,他只要牢记社会进化型史观强调不同的历史单位间共有的进步模式即可,至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些“在自然选择中发现达尔文所否认的道德原则,并为不受制约的经济竞争、资本主义及帝国主义辩护”^[7]的那些真正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我们最好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将人设定在人性的高度实际上最符合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所设计的“进化”逻辑,而把人降低到动物的水平,反而从根本上违背了他们自己为之癫狂的进化信念,成了一种违反“进化”逻辑的“进化论”。

析的历史哲学家羞愧的事实是:其实早在分析的历史哲学产生之前,马克思就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完美的答案。“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发展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11]解释的过程实质上不仅仅“是一个演绎的过程”^[15],它首先是一个归纳的过程。分析的历史哲学家纠缠于呱呱坠地的婴儿,却不理解大肚子的孕妇。

“思辨”由于分析哲学的攻击,现在已经变成了一项不太光彩的帽子,它那试图构建一种形而上学的宏大体系的雄心,现在竟被看作是自大的代名词而饱受怀疑。一种为人类宣示自信的哲学竟沦落到倍受歧视的境地,不能不令人唏嘘不已,我们可以把这种想象视作是哲学领域内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在历史学领域内的重现。作为思辨的历史哲学成熟形态的社会进化型史观承担着恢复历史的形而上学名誉的重任。正面迎接挑战,“元叙述的危机”或许将被证明是“元叙述的机遇”,其中最严重的挑战或许来自卡尔·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批判。

(三) 社会进化型史观与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批判

或许,我们在考察思想史时应该铭记的第一原则是:相对性是思想的绝对属性。每一种思想都有与其相对立的思想,它们同时正确,又同时不正确。既然卡尔·波普尔也说过:所有的理论都是假说,所有的理论都可以推翻,那么对待卡尔·波普尔哲学的最好方式就是“以理性批判的态度对待理性批判主义”^[42]。

卡尔·波普尔从证伪主义的方法论出发,断定“规律和趋势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断定在特定时间和空间有某种趋势存在的命题是一个单称的历史命题,而不是一个普遍的规律”^[43],进而否认历史规律存在的可能性,甚至认为任何声称获得了历史发展规律的知识,都是一种“难以置信的智力狂妄”^[44]和“集体主义的胡思乱想”^[43]。这虽然体现了人类谦逊的美德和可贵的自知之明,却丝毫不能给人以任何知识的启迪和热情的激发。他把批判的矛头指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但丝毫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今天仍保留着生命力和内在潜力的唯一的‘历史哲学’,当然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有关人类社会进化的能够自圆其说的唯一理

论……”^[45]而且他对唯物史观的批判的做法似乎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他不是出于绝对性地肯定“分析”才坚定地否定“思辨”,而是因为“思辨”遭到现时性的否定才现实地肯定“分析”。这种为否定而肯定的做法,更像是一种有打死老虎之嫌的事后诸葛亮行为。想象力的枯萎和洞察力的缺乏导致了在“思辨”上的无能,在“思辨”上的无能催生着“无能者”在“分析”上为自己的掩饰和证明。“不可知论”不过是“懒惰”在知识上的别名。

卡尔·波普尔并没有在怀疑主义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在他看来,至少历史还有它的存在价值,即使没有,我们也可以赋予它一种价值。“历史虽然没有目的,但我们能把这些目的加在历史上;历史虽然没有意义,但我们能给它一种意义。”^[46]但是这种怀疑主义的征程一旦开启,展现在分析的历史哲学面前的必然是一条通往彻底的怀疑主义和彻底的虚无主义的道路,这一点也不新鲜,因为这条道路早已由哲学走过。

五、康德的遗嘱

从事物的性质来说,从传统史学到新史学的转变并不是历史学的一种质的飞跃,它充其量不过是新领域的拓展和新方法的运用。只有从历史实证、历史叙述到历史的思辨再到历史学的分析的演变,才是具有上升意义的变革。“历史首先是历史事实,随后是历史认识或理解,最后才是历史语言……客观的历史事实、历史认识和表述历史的语言三个方面,共同构成历史意义的显现形态。”^[47]只有这样的过程才符合逻辑本身的发展规律。但是,文学批评并不是为了取消文学存在的目的而出现的,可惜分析的历史哲学似乎并不具备这样的美德。他们总是声称:“历史学最引人注目的事情就是,它声言要描写的事实乃是过去的事实,而过去的事实是不能再受直接检验的”^[15]。以不可“直接检验”性为借口,即使最睿智的法官也无法裁决哪怕是昨天刚发生的最残忍的案件。当历史学日益被视为一种文字游戏时,历史的合法性就被取消了,而否定了历史,那个否定现在和否定我们自身的目标,就不会再呆在我们的视野之外了。当我们仅仅是观念的存在时,上帝就会被倒推出来——哲学家自己成了上帝。分析的历史哲学家必会在兜了一个大圈子后发现,那些把自己绕进了思维的历史哲学家早已拔出脚的那个泥淖中,这是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必然命运。

不过,“后历史主义”在向着那个在它的必然路线的前方早已设定了的彻底的怀疑主义和彻底的虚无主义的目标越走越近的同时,也必然越来越孕育着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复兴。社会进化型史观在这其中所肩负的任务是:从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中“升华出一种崭新的历史哲学……借助于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在历史认识方法上的成果,重新探讨以往思辨历史哲学的主题……思辨历史哲学的重新兴起正是将传统的历史哲学——黑格尔式的思辨历史哲学与柯林武德式的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进行优势互补”,并进一步做跨学科的结合,“才能为新的思辨历史哲学提供更为坚定的认识基础”^[34]。具体地讲,社会进化型史观自诞生以来就一直执行着一种笔者称之为“康德的遗嘱”的东西。“我们现有的历史记载的时期对我们还太短,而不能希望在其中追踪出任何像是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所必须采取的普遍形式那样一种东西。”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康德“把它留给了一些在这个题目上比他本人更为精通的人们去从哲学的观点上写出一部普遍的历史”^[15]。社会进化型史观作为这个遗嘱的天然执行人尚未完全给出一份较为完满的答卷。结合当下世界历史发展的特征,社会进化型史观应从玄远的宇宙深处发现流淌在现实社会变迁中的秘密,应从本源意义上对文化的生成与发展做阶段论的考察,并以社会进化型史观独有的乐观主义的未来主义特征为人类展现出一个同样乐观的文化发展的光明未来。完成这一使命,如上所说,有赖于历史学家跨学科的综合能力。正如文化人类学家所说的:“进化总是包括分化和前进、稳定和发展。当人类学家认识到这一事实,与他们对文化自存、传播、变革的机制达到更深理解时,我们可以合理地预示人类学同样广阔的前景,包括最终成功地综合的前景。”^[48]

六、结 语

社会进化型史观是一种特殊的理论范式。它既与社会进化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也不完全等同于思辨的历史哲学,更不像分析的历史哲学所声称的那样早已进入了耄耋之年。从我们对社会进化型史观思维逻辑、历史沿革等方面的考察可以看出,它的产生发展是以人类社会进步为基础的。因此,只要人类社会进步的“表象”不会停止,社会进化型史观的历史便不会终结。历史学家早晚会从社会历史前

进的脚步中抽象出下一种社会进化型史观。因为人类从来都不缺少这种自大的迷思。

参考文献:

- [1] 王中江. 进化主义在中国的兴起: 一个新的全能式世界观[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 [2] 威廉·M·杜格, 霍华德·J·谢尔曼. 回到进化: 马克思主义和制度主义关于社会变迁的对话[M]. 张林, 徐颖莉, 毕冶,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 [3] 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8.
- [4] 何兆武, 陈启能. 当代西方史学理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 [5] 舒德干. 物种起源导读[C]//达尔文. 物种起源. 舒德干,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3.
- [6] 康德.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 何兆武,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
- [7] Futuyama D J. Evolutionary biology [M]. Sunderland: Sinauer Associates Inc, 1986.
- [8] 谢强, 卜文俊. 进化生物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 [9] 布斯克斯. 进化思维: 达尔文对我们世界观的影响[M]. 徐纪贵, 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0.
- [10] 达尔文. 物种起源[M]. 舒德干,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1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简要介绍》编写组,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12] 汤因比. 历史研究[M]. 郭小凌, 王皖强,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 [13] J·勒高夫, P·诺拉, R·夏蒂埃, 等. 新史学[M]. 姚蒙,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 [14] 汤因比. 文明经受着考验[M]. 沈辉,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 [15] 沃尔什. 历史哲学: 导论[M]. 何兆武, 张文杰,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 [16] 布罗代尔. 历史科学和社会科学: 长时段[C]//何兆武. 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20-25.
- [17] 汤因比. 历史的话语: 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M]. 张文杰,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 [18] 高概. 话语符号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 [19] Stern F.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 from Voltaire to the present[M]. New York: Meridian Books Inc, 1956.
- [20] Dewey J. The influence of Darwin on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M].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 Press, 2007.
- [21] 奥古斯特·孔德. 实证哲学教程[C]//徐浩, 侯建新. 当代西方史学流派. 北京: 中国人民出版社, 1996: 2-5.
- [22] 柯林武德. 历史的观念[M]. 增补版. 何兆武, 张文杰, 陈新,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 [23] 拉尔夫·勒纳, 伯恩斯, 等. 世界文明史[M]. 赵丰,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8.
- [24] 韩震. 西方历史哲学导论[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2.
- [25] 汤普森. 历史著作史[M]. 谢德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8.
- [26] 克罗齐. 历史学的理论与历史[M]. 田时纲,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 [27] 张广智. 西方史学史[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 [28] 徐浩, 侯建新. 当代西方史学流派[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6.
- [29] 姜义华, 瞿林东, 赵吉惠. 史学导论[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 [30] 章士嵘. 西方历史理论的进化[M].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4.
- [31]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M]. 范扬, 张企泰,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32] 奥古斯特·孔德. 论实证精神[M]. 黄建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 [33] 雅克·德里达. 马克思的幽灵: 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M]. 何一,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 [34] 姜芑. 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流派[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 [35] 卡尔·雅斯贝尔斯. 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 魏楚雄, 俞新天,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9.
- [36] 汉斯·萨尼尔. 雅斯贝尔斯[M]. 张继武,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88.
- [37] 托夫勒. 第三次浪潮[M]. 黄明坚,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6.
- [38] 庚镇城. 进化论的影响力: 达尔文在中国(序)[C]//沈永宝, 蔡兴水. 进化论的影响力: 达尔文在中国. 南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9: 1-10.
- [39] Turner J H. Herbert Spencer: a renewed appreciation [M]. Los Angeles: Sage Publications Inc, 1985.
- [40] 黑格尔. 历史哲学[M]. 王造时,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56.
- [41] 卡尔·波普尔. 猜想与反驳: 科学知识的增长[M]. 傅季重,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 [42] 赵敦华. 赵敦华讲波普尔[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43] 卡尔·波普尔.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M]. 杜汝楫, 邱仁宗,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7.
- [44] 卡尔·波普尔. 无穷的探索: 思想自传[M]. 邱仁宗, 段娟, 译.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4.
- [45]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 杨豫,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 [46] 田汝康, 金重远. 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 [47] 陈启能. 二战后欧美史学的新发展[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5.
- [48] 托马斯·哈定. 文化与进化[M]. 韩建军, 商戈令,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Social evolutionism as a historical view

LI Huai-shun, WANG Jia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Gansu,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further classify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the authors, through defining and comparing methods, explore a group of historical views with uniqu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speculative philosophy of history.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social evolutionism as a historical view is a kind of philosophy of history with a clear definition and extension. It has its own developmental history, it is a unique theoretical paradigm, and it has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social evolutionism, speculative philosophy of history, and so on. However, no confusion should be made among them because it assumes the responsibility of developing a new type of philosophy of history.

Key words: social evolution; historical view; philosophy of history; historical determinism